

这首小令并不算长。《缀白裘》六册卷二收《孽海记·思凡》一出，有“小尼姑年方二八”一调，计有二十二句，是明清传奇中最为流行的【山坡羊】名段，也是词乐互生法的一个典型样本，值得专说。从共时性看，戏文、昆腔、弦索调、目连戏、梆子等腔种都有《思凡》及其【山坡羊】的中心唱段。各腔“改调歌之”，转互移植，只有采用“词乐互生法”才有可能。从历时性看，刻印于明嘉靖间的《风月锦囊》卷一所收最早，只有十四句，到清代《缀白裘》、《纳书楹曲谱》已增至二十四句，明显有一个由简趋繁的膨胀过程。其增生变异的规则也只能用我们所说的“词乐互生法”去解释。《思凡》的“山坡羊头”在明代曲选中作“小尼姑年方十八，正青春被剃了我头发”，清代曲选作“小尼姑年方二八，正青春被师父削去了头发”，其中仅有个别衬字之别，格律相当稳定，可见几百年间变化不大。中间部分则改变甚多，除了把原来“他把眼儿睨我，我把眼儿睨他”的念白，变成了“他把眼儿瞧着咱，咱把眼儿觑着他”的唱词，还增出“他与咱，咱共他”、“由他把那碓来舂，锯来解，磨来挨”等一些铺叙形容的衬句。其“山坡羊尾”的扇面对句格在明代曲选中作“由他，我把念佛心悬梁上挂；由他，哎，火烧眉毛，且顾眼下”，清曲选作“由他，只见那活人受罪，那曾见死鬼带枷；由他，火烧眉毛，且顾眼下；火烧眉毛，且顾眼下”。虽有大量增饰，但其标志性句格仍然鲜明，仅有所放大而已。这些变化显然是因不同曲种间互相转移，乐与词双向适应，为达到新的平衡和谐所发生。但无论如何变化、增衍，首尾格律的标志格都未改变，说明不管是什么腔种，都必须保持这个基本的标志性的句格与节奏，否则就不是【山坡羊】，而是别的什么调子了。

目前我们所见篇幅最长的是冯梦龙《挂枝儿》卷三附记的一首【诉落山坡羊】，计有三百六十六句，其中间部分极尽增衍膨胀之能事，可谓把小曲叙事性的“数落”特征发挥到了极致，但“羊头”与“羊尾”的节奏仍然鲜明。这个极端之例也与规律吻合而不悖。李开先《〈市井艳词〉后序》说：“【山坡羊】有二……北简而南繁，歌声繁简亦随之，然而相类。”保持了标志性句格就等于保持了标志性乐格，故同调曲乐无论差异多大，总是有“相类”的基因或元素。这就是【山坡羊】千变万化而不离其宗，仍然称作【山坡羊】的内秘。

[作者简介] 杨栋，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。发表过专著《中国散曲学史研究》等。

• 札记 •

清代文人官年与实年不符的家族性

晚清著名书法家杨沂孙在《杨氏家乘》（今存上海图书馆）中，亲笔记下了其弟杨汝孙三个儿子的生辰：“同奎（榘），道光三十年（1850）二月廿九日寅时；同鼎，咸丰元年（1851）闰八月二十日巳时；同颖，咸丰四年（1854）闰七月廿六日丑时。”然而据顾廷龙主编《清代朱卷集成》（台湾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），杨同榘（改名杨崇伊，即杨圻之父）所填光绪六年科会试朱卷履历为：“咸丰壬子年（1852）二月二十九日吉时生。”杨同颖所填光绪十一年科乡试朱卷履历为：“咸丰丁巳年（1857）闰七月二十六日吉时生。”分别比《家乘》中所载小了两岁和三岁，可笑的是，咸丰七年丁巳只有闰五月而无闰七月，杨同颖虽然改了生年，却不慎在月份上露了马脚。显然，《家乘》所记为实年，朱卷所填为官年（即文人填报在官方档案履历上的年龄）。古代文人为了登科后能够延长仕宦时间，往往在填报朱卷履历时减少年龄；同时家族中有一人虚报年龄，就自然会导致其兄弟辈不得不相应修改报考年龄，如杨同鼎参加过同治十二年的乡试，虽然朱卷未能保存下来，但其填报的生年肯定会在咸丰二年之后，如果据实填写咸丰元年，就会出现弟年长于兄的怪事。这可谓家族文化的别样体现。

（湛 庐）